

曾國藩全書



曾国藩大传

曾国藩全书

壹

曾国藩全书

编 者：燕 林

责任编辑：王保华

特约编辑：兰 俊

技术编辑：娄 晶

出版发行：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印 刷：北京昌平奔腾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81.5

版 次：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册

书 号：ISBN 7-5385-0658-6/I·103

定 价：998.00元(全四册)

前　　言

曾国藩(1811年—1872年)，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清道光进士。为军机大臣穆彰阿得意门生。道光二十年，曾国藩超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道光二十九年任礼部侍郎，后历署兵部、吏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丁母忧回籍。此时，已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一路上声势浩大。年底，曾国藩奉命赴长沙帮办湖南团练，在此基础上扩编为湘军。咸丰四年，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天国，并率湘军进攻太平军。五年，在湖口九江被打败，退守南昌。次年底，再陷武昌汉阳。八年，占据长江。十年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次年，攻占安庆，奉命统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同治元年(1862年)奏派李鸿章率淮军援沪。三年，其弟曾国荃攻陷天京(南京)，受封一等爵，加太子太保。四年，奉命剿捻，无功而返，仍回两江总督任上。七年，调任直隶总督，奉命处理天津教案，遭到舆论谴责，不久调回两江总督任上。六七十年代，曾国藩倡导洋务运动，是洋务派的核心人物，会同李鸿章督办全国最大的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1872年，曾国藩长逝金陵，清廷为之震悼，赐谥号文正。

曾国藩在世之时，已是名满天下，被称为“中兴第一名臣”。他的门生故吏称颂他是“千古完人”、“人生楷模”。但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复杂的。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甚至于同一派别的不同人物对同一个历史人物都会有不同的评价。尤其是曾国藩这样时刻处于风口浪尖上引人注目的人物。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因为要推翻满清王朝，因而对曾国藩这位绞杀太平天国运动的满清王朝的忠臣恨之入骨。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湖南新华人陈天华也算是曾国藩的大同乡，在他的著作《警世钟》里，则痛骂曾国藩“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但同陈天华齐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近代杰出学者章炳麟先生评价曾国藩时则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既振旅，姑为王而农(王夫之)遗书，可谓知悔矣。…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贤孙，百世不能改也。”

与之同时代的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思想家，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之一梁启超先生则说：“曾文正公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焉可也。”“曾方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物也，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之不一二睹之大人物也。”

历史是最公正的，也是最无情的。历史会让蒙尘已久的金子光亮如初。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峡两岸掀起一股“曾国藩热”。一时间，有关曾国藩的著作层出不穷。曾国藩这个尘封已久的名字现在已是家喻户晓，许多人奉他为人生的楷模，更有许多人在他的流传甚广的《曾国藩家书》中寻找人生的智慧。曾国藩为什么会让如此敬重，会有持久不衰的“曾国藩热”？编者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曾国藩是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立言者往往不能立功，立功者往往不能立言，至于立德是最困难的，在历史上立功立言而不能立德者比比皆是。曾国藩并非天纵英才，刻苦自励，遂成为一代学问大家，但是又以学者统兵，建不世之功业。曾国藩功高盖世，官至极品，然而谦谨俭朴，堪为一代师表，所以说他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并非过誉之词。

第二：曾国藩做人和家教的成功。曾国藩咬牙立志，崛起于寒微之中，建不世之功业。在明清极端寒暗腐朽的官场里，在清廷猜忌不信任的情况下，曾国藩极力周旋，显示了高超的做人智慧。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人生最高理想。纵观古今，治家之难并不亚于治国，能治国而不能治家者不在少数。父祖建立卓著功勋，而子孙不成器者比比皆是。曾国藩的家教是最成功的。曾国藩在戎马倥偬公务繁忙之际，花了大量的时间，写了近百万言的家书。现在看来这些家书既有对日常琐事的安排，又有对人生哲理的深入探讨。家书既明白晓畅，又娓娓动情，无不令人读之动容。在曾国藩的教导下，曾氏一门人才辈出，历五六世而未衰。

第三：湖湘人才的崛起。清朝以来，湖南形成独特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信奉程朱理学，经世致用。曾国藩作为湖湘学派的核心人物，对湖南人才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曾国藩，推崇曾国藩，我们并不否认曾国藩是屠杀太平天国刽子手，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处于那个时代，他只能是中国封建社会回光返照式的悲剧人物。这是历史的局限性造成的，是任何人都不容回避的。我们不苛求古人，也不任意拔高古人。我以为推崇曾国藩做人治学的方法，和在政治上批判曾国藩并不矛盾，这本来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中国近代杰出学者容闳说过：“曾国藩是中国特殊教育制度下的特殊产物”。这也就是说，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的人物，为中国传统文化所铸就的精神遗产。研究曾国藩，学习曾国藩定会得到许多终生受益的东西。编者依据曾国藩生平记载和国内大量的研究成果编成这套《曾国藩全书》，分为《曾国藩大传》、《曾国藩成功学》、《曾国藩文集》（上下册）三个部分。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时间极为仓促，再因编者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目 录

第一章 家风半耕半读	(1)
一、悠远岁月	(3)
二、家风与影响	(5)
三、家法：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8)
第二章 读书与科第	(11)
一、只将艰巨付儿曹	(13)
二、湘乡曾氏的第一个进士	(15)
第三章 治学与交往	(17)
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19)
二、难得的良师诤友	(21)
三、砥砺品性	(28)
四、得不到“炭敬”的穷翰林	(34)
第四章 天子近臣	(37)
一、不失书生本色	(39)
二、署理部务，每日“自课八事”	(43)
三、直言进谏	(46)
四、穆彰阿慧眼识人	(50)
第五章 组建湘军	(53)
一、应命出山	(55)
二、改革军制	(59)
三、编练湘军	(63)
第六章 受挫湖南	(67)
一、越俎代庖，不避嫌怨	(69)

二、移师衡州	(71)
三、筹办水师	(73)
四、内部纷争,矛盾重重	(77)
五、四拒旨令	(82)
第七章 困守江西	(87)
一、兵败湖口,再次自杀	(89)
二、郝懿入江西	(93)
三、春风怒号,寸心欲碎	(96)
四、仰食他人,惨淡经营	(98)
五、参奏陈启迈,不得已而为之	(102)
六、罗泽南援鄂	(105)
七、困守南昌,力撑危局	(107)
八、蓄势待机,大军入赣	(109)
第八章 丁忧家居	(113)
一、“家门有大故,游子心不安”	(115)
二、委曲心事,委军守制	(117)
三、静思反省,全无是处	(119)
四、身在纯庐,心系军旅	(122)
五、军需部费,实难解决	(125)
六、改葬父母	(127)
第九章 决战安庆	(129)
一、守制检讨,再度出山	(131)
二、援浙之行	(133)
三、三河大败	(134)
四、李鸿章入幕	(138)
五、不愿入川	(139)
六、围攻安庆	(141)
七、总揽大权	(144)
八、困守祁门	(149)
九、缓兵之计	(154)
十、攻陷安庆	(157)
十一、为胡林翼请功	(163)

第十章 攻占天京	(167)
一、援兵赴沪	(169)
二、围困天京	(173)
三、兵临城下	(177)
四、孤城难下	(180)
五、紧缩包围圈，困死金陵城	(184)
六、凄风腥雨秦淮河	(186)
第十一章 功高不震主	(189)
一、攻陷天京	(191)
二、裁湘留淮	(195)
三、曾左失和	(198)
第十二章 剿捻无功	(203)
一、僧格林沁之死	(205)
二、不违王命，万难迅速出征	(209)
三、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	(212)
四、收服悍将，约法三章	(214)
五、老师无功，防河失败	(216)
六、剿捻失败	(217)
第十三章 倡办洋务	(225)
一、“近逼卧榻，世变正未可知”	(227)
二、“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	(230)
三、师夷长技，风气渐开	(232)
四、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	(239)
五、难以克复的矛盾	(241)
第十四章 出任直隶总督	(245)
一、晋见慈禧	(247)
二、裁汰绿营，训练新军	(252)
三、清理积案，整肃吏治	(254)
四、兴修水利，治理河患	(257)

第十五章 天津教案	(261)
一、震动朝野的天津教案	(263)
二、抱定必死，再立遗嘱	(266)
三、惟有委屈求全	(268)
四、毁议众生，众矢之的	(272)
五、“中外交涉，总以条约为凭”	(275)
六、怅惘无限，再任江督	(279)
第十六章 毁誉不计，忧江山倾圮	(281)
一、审定“刺马奇案”	(283)
二、整军经武，致力自强	(285)
三、“忧见宗社之陨”	(287)
四、期在“三不朽”	(291)
五、长逝金陵，“生荣”死亦哀	(293)
主要参考文献	(297)
一、原始文献	(297)
二、近人论著	(298)

【第一章◎家风半耕半读】

- ▲悠远岁月
- ▲家风与影响
- ▲家法：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曾國藩大傳

百家類編·卷之二

【家风半耕半读】

一、悠远岁月

清王朝的国体政体无异于前代，它是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上，明显地带有种族歧视的痕迹。

清朝入关之后，特别重视拉拢汉族士人参政议政，因而笼络了汉族地主，扩大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但是，满洲贵族对汉族官吏仍存有戒心，设计防范，不让他们拥有实权，特别是军权。清朝政权的中枢机构是内阁和军机处，其下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它们分管各项行政。内阁仅康熙一朝拥有较大的实权，自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之后，内阁便失去了实权，变成例行公事的机关。总揽一切大权的是军机处，重大问题都在这里商议，由皇帝作出最终决定，向全国发布政令，所以时人和后人都称军机处为“政府”。军机大臣由皇帝在亲王、内阁大学士、各部、院堂官（尚书、侍郎等）中特简差派，并有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和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区别，按一定的顺序排列。皇帝还任命一名亲王或大学士为首席军机大臣，称为“领班”，又称“首枢”。首席军机大臣多为满人，仗着皇帝对他的器重，总揽大权，汉员没有多少发言权，即使提出合理正确的建议也往往不被重视。鸦片战争时期的军机大臣王鼎，就是因为起用林则徐一事，在道光皇帝面前与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一再力争无效，愤而自杀的。六部的实权也多控制在满员手里，汉员往往不过是随同画诺而已。掌控清朝地方大权的官员是总督和巡抚，而总督的权力更大，各地绿营兵及其长官提督，都受总督统管。为防止汉族官员掌控军权，总督多任命满人，汉员不多。对于那些身任疆寄的汉族地方督抚，清廷有时也放心不下，往往指使满员暗中监视，密报他们的一举一动。对于一些地位不高但颇有实权的员缺，也限制汉员插足。比如掌管户部三库锁钥的下级司员和地处北京后方的热河道道员，就只限任旗员，不用汉人。另外旗员

家風半耕半讀

还享有其他种种特殊的权力，遇婚、丧、疾病皆可请假，假满复职。

清王朝创立初期，它的几代统治者都颇善于治理国家，乾隆之世达到鼎盛时期，乾隆后期各方面矛盾开始暴露激化，贪污成风，吏治败坏，朝政日趋腐败。与政治上日趋腐败的同时，清朝的财政与军事状况也逐渐恶化。乾隆中期以前，清朝财政每年收支相抵，还有盈余，到了嘉庆末年，国库已呈现出入不敷出的势头。清朝开创之时，主要依靠八旗，绿营只是起辅助作用；而平定三藩时，八旗已经腐败，战斗力大为削弱，攻取战胜，全靠绿营苦战之力。乾隆后期，绿营又重蹈八旗复辙。

随着统治阶级的腐朽和人民负担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趋尖锐起来。乾隆中期以后，长期隐藏、埋伏在民间的各种反清团体，诸如白莲教、天地会等其它名目繁多的支派逐渐活跃起来，零星的个别反抗逐渐发展为有组织的起义。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领导的清水教（白莲教支派）在山东首先举起了义旗，接着又发生了甘肃回民新教徒起义。这些起义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此起彼伏，即兴即灭，但却揭开了清王朝太平盛世的面纱，引发了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川楚白莲教大起义于嘉庆元年（1796）首先在湖北荆襄地区爆发，很快发展到四川、河南、陕西、甘肃。清政府征集调用了大半个中国的兵力，耗资二亿两，花了九年的时间才把它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从这以后，各地起义、变乱接二连三不断发生，此起彼伏，几乎没有安宁的日子。

清朝年间，湖南的经济文化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及至清代的道光年间，它在全国各省中仍属于不发达省份。王闿运说湖南是“财赋全盛寸，才敌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曾国藩也称湖南为“山国荒僻之亚”。所以，“道、咸前湘士很少被人知道”。同时，湖南的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也比较尖锐复杂。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多种民族混合在一起居住，他们分别与川、黔、两广的边境相连接，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一遇上天灾人祸，往往发生起义或变乱。乾隆末年的湘黔苗民起义，使清政府倾动了七省来调兵转饷，成为持续九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的前奏。道光以来，各地起义更加频繁的发生。道光十二年瑶族赵金龙起义，四年后又发生蓝正樽起义，而小规模的反抗和冲突则几乎年年不断，到处都是。

湖南学术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二是注重经世致用。这就是由湖南的这种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因素造成的。其思想学术深受理学影响。早在北宋初年，那时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的长沙岳麓书院，就有许多著名学者在那讲学。南宋时，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朱熹和张载也曾在那讲过学，弟子多达千人。其后，学术界几度变更，至清代又兴起了训诂考据之学，但对湖南士人几乎没什么影响，程朱理学还是占统治地位。在经世致用方面，重视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的，则首推魏源。他长期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重视考察历代典章制度，对当时的学术风气有着很深的影响。他还编辑了《皇朝纪世文编》一书。这种既讲求程朱理学，又注重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对曾国藩这

一代士人影响很深，可以说是其思想集团形成的思想基础。自清代乾嘉以来，湖南名气最大的两大书院岳麓和城南就讲习宋学，注重实用，实际上成为培育曾国藩集团的教育基地。集团的骨干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刘长佑等都在此学习过，不是就学于岳麓，就是毕业于城南。至于曾国藩自己为什么还会成为这个集团的首领，则还有其自身的原因。

二、家风与影响

曾氏祖籍衡阳，世代业农，难以摆脱贫穷的生活。清嘉庆十三年迁入湘乡县南一百三十里外的白杨坪，到了曾竟希的祖父曾元吉时，经过夫妻俩一生的勤俭操劳，家业逐渐发达。不仅在湘乡大界盖起了几处宅院，还在衡阳青定塘湾买了40亩薄田。曾元吉年老时，将自己辛苦了一辈子所积累的家业，包括大界的宅院和土地，大部分给了子孙后代。为不拖累后代，曾元吉仅留下衡阳的40亩地作为养老送终之用。

乾隆二十九年(1764)，已到古稀之年的曾元吉病故。他的子孙们靠着分得的家产，开始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仅靠出租土地的租金就能维持生计。嘉庆二年，为纪念惠及后人的曾元吉，曾氏族长召集族人，决定将一年的租金收益拿出来，在圳上购置祭田10亩，每年清明时节，后人前往祭祀。曾元吉在衡阳留下的40亩田，不久也定为祀田。

曾元吉有六个儿子。次子曾辅臣，号辅庭，娶蒋氏为妻。比起上一辈人，生活或者说生存的压力减轻了许多。曾辅臣分得一份家产，但不改勤俭劳作之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仅55岁的曾辅臣留下独子曾竟希撒手而去。

曾竟希有着农民的忠厚传统，为人颇为厚道。三四十岁时，家乡来了一四川游客，俩人情投意合，很快结拜为兄弟，川客也就寄居在曾家，一住就是十多年。久寄他乡思归离。一天，川客对曾竟希说要回四川去，曾竟希苦苦相留。川客说：“贤弟不要难过，我离家多年，回去看看，还要来的。”曾竟希难舍难分地说：“自古道‘少莫入广，老莫入川’，四川路遥山峻，你如今已年满半百，回到老家，怎么还能再来？”川客却信誓旦旦，说：“我一定来与贤弟共享高嵋山之乐。”说罢，兄弟二人跑上高嵋山观望，选定山麓的大西冲一处地方，打下木桩，作为两人将来的葬地。川客对曾竟希发誓：“不管谁先去世，左边(此地习俗左大右小)葬你竟希君，我拣右边。”曾竟希说：“你兄长，该葬左边。”两人再三推让，珍重而别。但川客一去不返，音讯杳然。

迁入白杨坪的第四年冬天，竟希老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条巨蟒

从天而降，先在宅堂左右盘旋良久，随即又进入内庭环绕一番。老人惊悸之余，正琢磨此梦的吉凶，忽听家人报喜，说孙媳妇生了个男孩。竟希老人忙把儿孙召来，告诉刚才所梦，并说：此乃祥兆，他日这个孩子必将光大我曾氏的门庭，你们要好生看护！

曾竟希老人的儿子曾玉屏有三个儿子，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次子早卒，三子骥云未曾生育。因此，自从长媳有了身孕后，曾玉屏就希望曾家后继有人，希望是个男孩。为此，一向不信算命的他，破例请算命先生卜筮男女。长媳临产那晚，夫人去接生，他在自己屋里守候不睡，还几次跑进祖堂添油剔灯，焚香祷告，乞求祖宗保佑。夫人接完生回屋，他急不可耐地问是男是女，只到得知是男婴，方才大松一口气。

在曾氏家族血脉相传中，曾玉屏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对曾国藩的影响也最大。无论是早年求学交友，还是以后几十年仕宦生涯，在曾国藩身上，似乎都有曾玉屏的影子。

曾玉屏，号星冈，少时秉受家训，勤奋好学，但长大后由于家庭稍微宽裕，便沾染上不少坏习气。他有书不读，沉湎于嬉戏游玩，经常骑着马到湘潭街上，与那些纨绔子弟混在一起。常常是太阳升起一丈多高，他还没有起床。因此家族长辈都讥笑他轻浮浅薄，恐怕今后会把家财败掉。

长辈的讥笑刺中了曾玉屏的心，他真的不希望曾氏家族几代人的努力毁于自己的手中。于是反躬自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将马卖掉，徒步回到家中。从此以后，他每天东方未晓就起床来到农田，一生如此，再没有懒惰过。这就是曾门家训中“早”字决。

湘乡地处丘陵地带，全县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是起伏不平的山丘。在这块土地上，除了靠天吃饭外，还必须勤劳。曾玉屏像“愚公”一样，开始了在山丘上造梯田的尝试。曾国藩后来回忆说：35岁那年，他在高嵋山下租了一间简陋的茅屋。那儿的梯田坡陡高峻，田块的面积小，几乎和瓦片一样。他开凿石山，开垦荒地，将十几块小田块连接成一片大田地。这样一来，种田人才好耕作。曾玉屏还种了半畦蔬菜，每天早晨亲自去除草，傍晚又叫佣工去施肥，走进屋内喂猪，出得屋来又养鱼，这样那样的事，从来就没有停过。

从辛勤的耕耘中，曾玉屏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十分自得。他悟出这样的道理：凡是自己亲手耕种收获的粮食、蔬菜，吃起来味道特别鲜美；凡是自己历尽辛苦得到的，享用起来也非常的心安理得。

勤劳磨炼了曾玉屏，曾玉屏也在勤劳中得到了大自然的回报。当曾玉屏把鳞甲一样的小山丘改造成阡陌相连的田地时，乡里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始则怀疑，继之赞服，后来都竖起了大拇指，而村中乡邻有什么难为之事，也都找他来排忧解难。

在农村，重男轻女十分普遍。看一个家族兴旺与否，主要看人丁是否兴旺。

如果一户人家膝下无男，往往被人看不起。因此，长孙曾国藩的出生，预示曾家后继有人，也预示着这个家族有不可限量的前途。曾玉屏更感到责任的重大。他回想起自己的先人自从元朝、明朝时就住在湖南衡阳之庙山，几百年间都没有立宗祠，于是便与宗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商量、筹措，建立了祠堂，并定于每年十月举行祭祀。又与家族中人商量，另外立一祀典，每年三月举行祭祀光大曾门的曾元吉。

曾玉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后辈人：“世间消灾求福，往往祈于神灵，这是不可取的。其实能够降福保佑自己的，莫过于自己的祖先。因此，我每年设祭，特别重视生我养我的祖先，而对其他的祭祀，则不很重视。我们曾家，后世即使贫穷了，但礼教不可毁坏；子孙虽然愚笨，但家祭不可从简。”这些对后来的曾国藩有很大影响。

曾玉屏早年失学，成年后深以没有文化为耻。因此既令子孙拜名士为师，自己也喜欢交结文人，希望他们经常登门。对那些品格端方，老成稳重的人更为敬重，从不敢怠慢。一般的亲戚朋友也热情接待。每当乡里邻居、朋友亲戚遇有婚丧嫁娶之事，曾玉屏从不委派晚辈去应付，而是亲自登堂，郑重其事。久而久之，曾家在白杨坪远近数十里，也就颇有声望了。

曾玉屏治家极严，一家大小，包括大他七岁的妻子王氏在内，见了他莫不屏神敛气。曾国藩的祖母平时“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竦息减食，甘受折辱”。低辈分的曾家人更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对于曾国藩的父亲麟书、叔父骥云兄弟，管教严厉。

晚年的曾玉屏并不以为家中出了大官而稍怠惰。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曾国藩已入翰林。曾玉屏对儿子曾竹亭说：“宽一（国藩）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靠他吃饭。”曾玉屏还一直坚持种菜、拾粪，不丢“勤俭”二字。

曾玉屏有一句座右铭：“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扫脚棍”。讲的是做人处事都要把握分寸，祖父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都对年青的曾国藩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曾国藩对他祖父很崇拜，他认为曾玉屏的威仪、言论雄伟非常，他与曾国荃虽然位至督抚，但其威重智略远不如曾玉屏，只是由于没有机会，才使他祖父终老山林，而未能一展其志。曾国藩说，他祖父经常教训自己的子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还说，他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这些话都成为曾国藩做人的格言。可以说，曾玉屏的言谈笑貌、一举一动，无不对年轻的曾国藩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其经营产业的殚思力行、训斥曾麟书时的专横刚愎，以及父祖两代功名心之急切，都深深地印在曾国藩年轻的心灵上，不仅成为他当时发愤攻读、追逐名位的动力，而且成为他后来政治生涯中坚韧精神和顽强意志的思想渊源，他后来常说的所谓“挺经”，主要就是从他祖父那里来的。

三、家法：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曾家的家法具有封建王朝的普遍性。历代不忘耕读之本，耕是吃饭的本事，读是人世取功名的根本，曾家的家规到曾玉屏时已具粗型。他创立的家规，要求家人必须遵守，其中有的是普遍见之于中国农村家庭的。如“男子耕读，女必纺织”，有的则是曾玉屏独特的创意。如，他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疏远六种人：看风水的、算命的、医生、和尚、巫道及做客赖着不走的。

对祖父曾玉屏创立的家规，曾国藩归结为八个字，后人戏称为“八宝饭”：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书：就是读书。耕读文化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的写照。按照儒家“天下之本在家”的解释，一个人的所有作为是从家庭开始的。而保持家庭兴旺的根本之路就是耕读。耕，代表生产基业；读，代表基本教育。在过去的家庭中，除极少数的例外，每个人总要读三年五年的书，即一般女子，也至少要读一二年的书，俗称“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曾国藩的诗作中，也多以“耕”、“薪”入句，如早年诗作：“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是耕读生活的写照。

蔬：就是蔬菜。曾星冈说：凡蔬菜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这不仅是心理作用，而且也是一个事实。在农业社会里，商品交换很不发达，因而自给自足十分重要。耕读之家，田有谷米，园有蔬菜，可以说无所求于他人。

鱼：鸢飞入天，鱼跃于渊，天机活泼，是兴旺气象。曾国藩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足见养鱼，不仅供应口福，而且可以增加生气，生气勃勃，则家道兴旺。

猪：生猪至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更可想几百年前的农村了。早在清前期，即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而每年腊冬之月，宰牲祭祖，阖家相聚，享受劳动的果实，自有一番田园乐趣。

早：就是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提倡早起，就是奖励勤劳，增加生气，颇合养生之道。俗话说：天道酬勤，而勤字之本是早。

扫：实际是讲究卫生，减少疾病。在没有医疗条件的农村，人的生命是依赖于自然的。为了减少疾病，讲究清洁干净就很重要。扫，就是扫除，包括洒洗。庭阶秽物，桌几灰尘，要洒扫干净，虽至贫至苦人家，也不例外。年终的时候，屋